

# 凡人纪事

肖波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# 我看《凡人纪事》

姚凤华

我和肖波是 1975 年认识的，一直有所联系。1984 年他上大学，我和绍慧送给他一个笔记本，写了几句话：“——说你知道的话，办你该办的事，做你想做的人”。与他共勉。

这本小册子是肖波 1970 年到 1980 年的工作、生活的真实写照，曾在县里的小报上连载，颇受读者欢迎，现在辑印成书，很有必要。

首先，它与那些名人回忆录相比，更具有平民意识和普遍意义。

目前，有些名人也出过这类文章，那些人的成功有天赋因素，有时代的机遇，凡人难以效仿。大多数的人还是像肖波一样，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，在平凡的环境里生活。在文学创作上，肖波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，仍

是骑着没有后架的自行车。他迈着平凡人的脚步，带着普通人的心态，溶入了这个社会。他的经历，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。

其次，这篇纪事与艺术作品相比，更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。

肖波是从事文学创作的，虚构是他的职业，这本书则不然，其材料来源于他的日记，绝非杜撰；其观点出自他的肺腑，不属表面文章。他努力显现自己，也努力解剖自己，有实事求是之意，无哗众取宠之心，所写的事和人，都是客观真实的，读起来倍感亲切。

其三，它与通常的札记相比，更富于系统性和资料性。

本书采用了编年体，以时间前后为序列，可以使读者抚今追昔，浮想联翩，重大社会历史事件，多有涉及，又能使读者咀嚼回味，冷静反思，很有史料价值。

我愿意将这本书推荐给读者。

## 目 录

我看《凡人纪事》 .....	(1)
1970: 卖挂面·喂牲口与海河·海南岛 .....	(1)
1971: 婚姻·就业 .....	(17)
1972: 从兽医站到文化馆 .....	(31)
1973: 大鼓·皮影·工作队 .....	(45)
1974: 批林批孔与王氏宗谱 .....	(59)
1975: “反资产风”及其它 .....	(73)
1976: 多事之秋 .....	(89)
1977: “五·七干校”·监狱·古墓 .....	(103)
1978: 《俩书记》·巡回定稿·聪明误 .....	(117)
1979: 歌德? 缺德? 馒头窝头生熟论 .....	(131)
1980: 讲习班·小树·杨三姐 .....	(145)
后记: .....	(159)

卖挂面·喂牲口  
与海河·海南岛



## 1970： 卖挂面·喂牲口与海河·海南岛

五百多年前,安徽宣城人王文进移居滦邑古城之西,繁衍了千数人,我成了第二十代子孙。

不知为什么,人生没有多少天真与活泼,倒造就了许许多多固执与自信。稀里糊涂就年满了二十周岁。

我缺乏理想,常怀自卑心理,却又不时滋长着争强好胜之念。公社农业中学毕业后,理所当然的当了社员。也许我天生缺乏庄稼汉的素质,因此,又是当饲养员喂牲口,又是搞副业卖挂面,又是编写节目做宣传,又是在专案小组整理案卷,数次转换行当,似乎比捋锄把子轻松一些。

先说当饲养员。

这活儿有人想干也不明言,有人不想干便借故推辞,上边则要求必须政治可靠,避免阶级敌人捣乱破坏。队里的饲养员出了空缺,便用“上轮”的方法来解决,我成了第一轮人选,便做起铡草、挑水、添料的营生。喂牲口也有学问,我终未能登堂入室,只是学会了系牲口的绳扣儿。那扣儿系上,一解就开,牲口那头却是越勒越紧。记得有一头牛名叫“十六只眼”源于队里的八名社员从集日挑选买来的。本来,只是队长同一名社员去买。赶集的社员也去主动参与,生产队只好都给了补助。结果,仍然有

人品头论足,说八个人十六只眼买得这头牛并不怎么样。“十六只眼”也就成了这头牛的名字。可见,集体事业不太好办。

两个月后,我又被分配去搞挂面加工的副业。这也是因为社员们对搞副业的人不信任了,怀疑把挣的钱装入了个人的腰包。

我的职责是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,沿街叫卖喊出第一声,确实鼓了几次勇气,以后也习惯了。近则一、二里,远则十数里,除了每天挣八分工,还有两毛钱的补贴。

我学会了欺负弱小的本领。

一斤麦子换一斤挂面,另收加工费。开始几天,我总是圆不上帐,缺斤少两。这是因为有的老娘儿们从家里麦子称好了、或缺半两、或缺三钱,也不好意思再让她抓一把来。队长是小贩出身,告诉我“堤内损失堤内补”,咋补呢?比如说傻老娘儿们或是小孩子端一大瓢麦子来了,就多称他点儿也不显。看来,做买卖讲童叟无欺并不可信。为了把营生干好,我只能如此而行了。

说到编节目,是斗批改工作队进了村子以后的事,充其量是配合运动摇旗呐喊。内容不外是“朵朵葵花向太阳,颗颗红心献给党”之类。有一个节目是宣传办合作医疗、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等新生事物的表演唱,其中演“丁”的演员最后总是说上一句“这个大喜事儿。咱们快快去宣传”。久而久之,“大喜事儿”成了她的绰号。也就说明艺术的力量。在人员不足时,我也曾充数登台。不过,从未抛头露面。这是为什么呢?我只是演举毛主席画像的角色,挡住面孔,供人们众星捧月地跳跃一番。

后来,工作队又让我负责整理村中“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”的案卷,同时接待内查外调人员。因此,使我了解了解放战争的真实历史。由于性格的关系,我的阶级立场谈不上鲜明坚定,有时也按村里的辈份“大叔、二爷”地叫着,因此有了个好人缘。这些



人都不是敌人，最终仍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。

这年的1月28日，我参加了县里的文艺工作会议。大概是因为我编写过文艺节目的缘故。

会议的重点是传达唐山地区文艺工作会议精神，批判梁斌的《红旗谱》、《播火记》，还有田间的《赶车传》，远千里的《谈刊物的风格》。会上，还介绍了阶级斗争新动向，比如邢台地区出现了瞎子说书，学了毛主席语录后说什么闲语少叙，书归正传；还有的地方死了人，请喇叭吹的竟然是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的曲调，这些都是政治性的反革命事件，告戒大家要提高警惕云云。

初次到县里开会，深受鼓舞。县委报导组的老刘原是认识的。四清运动中，他住在东院的五婶家，那时，我正上六年级。记得还从他那儿借了一本书看。那是一本笑话集，其中有一句“远看城墙锯齿，近看城墙齿齿锯”，到今仍记得。

从县城归来，便写了几篇批判文章，什么“拔黑旗，插红旗，灭鬼火，点烈火”，什么“决不许为地主阶级遮丑”，寄往县广播站和《唐山劳动日报》社。结果如石沉大海。另外，还写了几篇小通讯，心存侥幸，盼望能公诸于世。

3月5日，我去唐山的三叔家时，下午，鬼使神差一般去了《唐山劳动日报》社，在门口徘徊良久。仍然没有胆量进去，只好在厨窗的报刊栏前驻足。我看到了“这个光千万不能沾”的通讯，下面印着我的名字！不错，是我的稿子！

我的心跳骤然加快。

我一字一句欣赏着。确实是欣赏。

我看罢，恋恋不舍的走开几步，又折转回来，重新审视了这小小的“豆腐块”。

小庙的神仙，没见过大香火。人生的价值也许就从这里开始。

4月13日,我被抽调到公社镇反办公室,协助斗批改工作队开展工作。

4月24日,我批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。这一天,恰好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,举国欢腾着收音机里传来的《东方红》乐曲。

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。刮起了“信号弹”风,民兵们天天晚上到田野去逮“信号弹”,闹得草木皆兵。还有一个八旬老头儿被枪毙了,罪名是编写反动影卷,我曾去刑场看了一眼,他满头白发,正屈卷着身子抽搐。

5月20日,毛主席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的声明,自上而下组织收听。随后,我们几个年轻人商量写一篇消息,由我执笔,题为《伟大声音震环宇,全球烈火送瘟神》。连夜徒步送往县广播站。到了县城,天近拂晓,广播站大门尚关闭。我们只好将稿子塞入门缝。当天,稿子广播。足见追时代,赶潮流颇为卖力。

6月4日,去北京。

事情的缘起是,我的一个叔伯姑嫁到邻村,姑父已病故,他扶养三个幼子艰难度日。她的母亲即我的四奶奶早年去北京当保姆,与家里联系不多。我爷爷对姑姑视为亲生,多有照料。据说,我那四奶奶清晨为主人去买菜,摔了腿,人家便不管她了,全不念数十年的操劳。姑姑听说后,让我帮助她将四奶奶接回老家来。

北京,是世界革命的中心,亿万人民向往的地方,几乎人人都会唱“我爱北京天安门,天安门上太阳升。”

待到了北京,也不过如此。给我的印象,除了人多之外,就是动物园里的长颈鹿脖子果然是长。

7月24日 灰色的星期五。

我被公社打发了，本来是临时抽调，工作不需要了是很正常的理由。但是，我总认为有一个只可意会的原因。

土改时，我二叔入伍参军，俗称“全拉”，从十八到四十五。我们村里的情况是，大部分人都跑回来了，他没有跑。村里分了财主家的五间棚子做为胜利果实，一直由集体借用。四清运动中，某些干部以为我家是中农，不应参加平分为借口，把棚子收归集体，待到我能识字读报了，从有关政策文件上看到参军入伍者所分土改房屋财产，即使是地富出身的也不得收回。我有在公社公干之便，向公社革委会刘主任谈及此事。刘主任说，听说你家的房子够住了，给大队就给大队吧。看来他知道这事，顺水为村里推舟而已。我说如果宣布是我家的，我献给大队倒也无所谓，这样没收我不好接受。

刘主任笑了笑未置可否。

几天后，大队要盖机井房，准备拆这棚子的砖石木料。我无力阻止，便到县人民法院反映，县法院的一名同志即刻打电话通知公社和村里棚子不能拆，按政策办理。

这样一来，胳膊拧过了大腿，大腿有大腿的权力范围，把你踢开是轻而易举的事。我只好从群众中来，又到群众中去了。

辩证法告诉我们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，相互依存的，我从公社回村，对象也吹了。

我自幼丧母，时年7岁，下面还有两妹一弟。弟弟前几年由在东北工作的二叔抚养，小妹刚出生几个月，只好送了人，我一直靠奶奶照料。此时，奶奶已年过七旬，爷爷已于1968年去世，临终仍念念不忘我的婚事，担心我有打一辈子光棍的可能。奶奶为我着想，便替我张罗起来。

是年，奶奶为我张罗了本公社某村的一位姑娘，她家是地主成份，我受的是阶级教育，心里不愿意，也不便伤老人的心，就默

许了。交往几次，人家看出了端底，觉得不投缘，主动地退了，我也感到轻松，像是卸下了负担。

奶奶忧心如焚，托人情，说好话，让左邻右舍继续为我操心。

在这方面，我很不成熟。对于婚姻连想也没想。如果能主动些，也许在村里办宣传队时就知道恋爱。村里的宣传队里就搞成了一对。乡亲们都知道了，我却昏然不觉。

经人介绍，我又同一位叫敏的姑娘见了面。

她同意，我也同意了。

又是几番交往，相互间觉得还算有缘分，我从公社回村，媒人就说女方要退婚。敏并不势利，觉得很犹豫，有两、三次的反复，我总是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。那时说，一工二干三教员，最心甜的是军官。她的姐姐们找的对象都是吃皇粮挣工资的，她如果是嫁一个庄稼佬儿，自然受到劝说乃到挖苦。媒人也说，退婚是她姐姐们的主意。

我表示理解，恋爱自由嘛！

每年村里要派民工去挖海河去修水利，听说是累活儿，队里给买一双胶鞋做为刺激，我正当年，便报名参加了。

10年15日晚饭后，我们出发了。

每人一辆“海河车”，车上装着搭窝棚的苇帘、木杆，一溜小跑，一路欢声笑语，大约近百里路程，到了滦县县城已是清晨四、五点钟的光景。我们在滦县的校园暂歇，躺下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乘火车到了北塘，安营扎寨，在一片荒滩上搭起了窝棚。

在海河工地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我只拉了三天车，步步登高，力不从心，恰巧有一项为火车站盖房的工程，需要几个人，带队的负责人便让我去了。这活儿不累，我尚能胜任。

收工吃了晚饭，十几个人在窝棚里闲着没事，只有闲聊。我

感到很空虚,就买了一本关于针灸的书,看了看“人中”、“印堂”、“足三里”的位置,力图学点治病救人的技艺,结果不能持之以恒,闹得半途而废。

我没有料到竟得了一张“三好民工”的奖状。村里说了算,带队的叫王全文,是教师出身理解文化人的处境。我体力不行,却受奖励,恐怕是对我尽力而为的鼓励。论贡献,我出的力并不多。

从海河工地归来后,听说县里组织去海南岛育种,这是一件“经风雨,见世面”的事,我便萌生了“天高任鸟飞,海阔凭鱼跃”的心绪,要求走一趟。

育种者,培育杂交高粱种子也。杂交高粱属高产作物,种子有限,又需大面积推广,聪明人便想出了这个主意,利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,冬季繁衍一茬,以供来年春天播种。

杂交高粱分为父本、母本,利用杂交优势,育出良种,犹如驴马相交而生骡子。

郭沫若先生曾写过“沁园春”一首,题为《咏杂交高粱》,副题标明是献给努力进行育种、栽培、推广和宣传工作的同志们,词云:“碱地之花,远超纲要,不等寻常!有人培阍种,雄需不育,天然母系,雌蕊孤芳。使之杂交,因而繁衍,亩产能增四倍强。收成早,更抗虫耐脊,涝旱两忘,相期备战备荒。首先是精神要武装。把‘两论’深研,全心全意,‘三篇’朗诵,同住同商。廿又六天,花期差距,控制提前自有方。循此道,向自由王国,永远飞翔。”

郭老系文坛巨匠,如此词作明白如话,似嫌文采不足,当是应景之作,信口道来。

海南之行是12月11日动身的,自带行李,庄稼人没有刷牙的习惯,也无所谓牙具。蚊帐倒是必备的,说是那里蚊子很厉

害。

当晚到北京,换乘了第五次特别快车。经河北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四省,跨过黄河、长江,14日中午到达黎塘。

黎塘是小镇小站,当为交通枢纽。三个日夜的旅程,由北国到江南,耳目一新。街中有卖甘蔗的老汉,听到我们的口音,以老乡称之,态度颇为热情,经询问,原是山西人氏,客居于此。

这里的饭店很简陋,并且猪只进来招摇。买了碗米饭,同伴们又商量从上黑板的菜谱上挑了一份名儿新鲜的菜,原来是鸭子的头、爪,有甜味,不习惯也不可口。桌上备有一罐,大家以为是糖,拌在米饭中才知道是盐,不免嘻笑一番。

当夜乘慢车,第二天午间到达广东湛江。安顿住宿时,也有一段小插曲。

原来我们只一行人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位妇女,年约三十余岁,在河南某单位工作,前去海南石碌铁矿去探望丈夫。这样就成了同路人。登记住宿时,我们说:“还有一位女同志。”服务员却道:“住在一起嘛!”我们急忙解释,“是这位女同志,同路的。”“是啦,都住在一起,没有关系啦!”

果然,客房可容纳二、三十人,上、下铺,里面已有男女老少数名。好歹每床有一顶圆蚊帐,撒落下来,便各自睡去了。

看来,南方男女观念比较淡薄。

16日改乘轮船,越过海峡,傍晚时抵达海口。海口是海南岛的首府,特别行政区所在地。

20日到达目的地,名为昌江县红卫公社红星大队。“红卫”“红星”是文革中改的名称,原先不知叫什么。

这里群山环抱,居民是黎族。我们住在大礼堂内,是用条椅搭起来的床铺。

我们这支育种队三十几人,有四名公职人员。领队老唐,据

说担任过工委书记，刚从“五七干校”解放出来；技术员老于，单位在农业局；会计老郑，是从县人民银行抽调的，还有一名随队医生老杨，原在胡各庄卫生院工作。其余就都是各公社的庄稼汉了。

百里不同俗，何况在这万里之遥的海岛，生活习俗果然大不相同。

这个村寨有几百口人，每家住的房屋是窝棚，用竹子夹的，抹了泥，上面是茅草。屋内陈设简陋，大都是有一张木床，床上只有线毯，既是褥子又是被，铝锅用三块石头架着，脏水顺着墙角流到屋外，墙壁上挂着砍刀、斗笠，除此之外，便没有什么物件了。

一日四餐，除了早晚，在上午 11 点，下午三点左右还吃一顿饭，饭是线米粥，顿顿如此。菜是野菜，并无油水，日子颇为清贫。

黎族没有文字，只有语言，解放以后，办了学校，学习汉字、普通话，初、高中毕业生就成了我们与当地沟通的“翻译”，按照协议，育种用地需要赔产，我县代交公粮，当地则要派些劳动力协助我们田间管理。

在黎语中，凡往嘴里放东西，不管是吃，是喝、是吸都用一个“拉”字，比如吃饭是“拉它”，抽烟是“拉杂”，收工时光，遍野就响起“蹦个拉它喽！”的叫喊，相互招呼着回家吃饭。

女人穿筒裙，虽有花纹，却很脏，很旧，也许一件衣服要穿两、三年，我们戏称那筒裙是“半截口袋”。

女人原有纹面的习惯，青色的花纹刻在两颊。解放以后，国家采取措施，严令杜绝了。而解放以前出生的，脸上纹有不同图案的花纹，加上嚼槟榔牙齿变得发黑，模样如鬼一般可憎。

黎族的男女青年长到十六、七岁，就同父母分开居住了，独

自占据一个小窝棚。大约在夜里十点钟，村里的狗一阵一阵地叫着，这是幽会开始了。做为家长，不但放任自流，并且女儿交往的小伙子越多，心里越高兴，他们的理由是，招引的人多说明他女儿不错，如果没有人登门，不是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了吗？

更多人往往是有了小孩子才结婚，不过，去公社办理登记的还是少数人，大多数人嫌麻烦，认为再离婚还得办手续，不必要。

听说这个村的妇女主任男女关系比较随便，离过两次婚，因此，未能加入党组织。可见，做为领导不是严加限制，也是采取了一定措施来倡导现代文明的。

我们住的礼堂，带有耳房，耳房分两层，下面是村信用站，育种队的几个人住在阁楼上。信用站的负责人年约三十几岁，穿着整洁的中山装，会说普通话，在村中鹤立鸡群，他是本村人，却在信用站住宿。后来，阁楼上的人发现，常有一名姑娘来他这里颠鸾倒凤，好事的人询问村民，才知道这姑娘在公社高中读书，看上去她皮肤白，身段苗条，比起其他村中的女孩略胜一筹。我们的人说三道四，不知怎么传到信用站这位负责人的耳朵里，他反映到公社，说育种队破坏民族团结。老唐开会对大家说，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，今后要注意，不能乱说。

在政治上，黎族同胞的阶级立场鲜明，对共产党、毛主席怀着深厚的感情，这是因为在旧社会遭受的压迫太沉重了，有人说，那时要上山打柴，也得给村主送礼。是共产党毛主席让他们翻身得解放。这个县的县长原是黎族，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死了，理由是他想搞民族独立。特殊年代，众说纷纭，恐怕这也是不实之词。

一天晚上，村里召开批斗会，我们也去旁观。只见一个四类分子跪着，人们纷纷发言，数说他的罪状，我们听不懂，问旁边陪同我们的“翻译”，“翻译”说，他不让他的小孩在学校参加劳动，



破坏农业学大寨，大家要打死他，问他行不行，他说不行。

阶级斗争，一抓就灵，灵就灵在有凝聚力。

出身不好的人搞对象也有影响。这里搞对象自由，大多数是本村的，自给自足。出身不好的小伙子怎么办呢？只有靠挖河（他们叫修水利）的机会来弥补不足了，挖河不像我们只能分配青壮劳力，而是男女老幼均可，按每户的人口下达土方指标，不管采取什么办法，完成任务就可以。这样，有的家就派女劳力，甚至老太太去洗衣、做饭、看孩子，青壮劳力同这些人相互补充，多挖几个土方，省了自己再奔锅奔灶。这样调济，打破了村与村的界线，出身不好的小伙子就有用武之地了，据说男女分成两排，共住一个大窝棚，夜里，男的那一边人数越来越少，都挪过去配鸳鸯了。在这种条件下，小伙子搞成对象并不奇怪，待到知道了底细，生米做成了熟饭，又有了感情，阶级观念也只能淡薄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了。

我们自立伙房，用饭票买饭。春节，照例要吃饺子，包饺子饮事员难以忙活，只好把面粉、肉馅分到各组，自力更生。老唐又提出，过节了，可以请一请每个生产队的队长和帮助我们管理高粱的积极分子，以便联络感情，对今后工作也有好处。

别的组照办了，请了几个人，比较顺利。我们这个组晚了，结果不少民族同胞不请自到了，来了一大群人，前面抬着米酒和“崧”，崧是用粘米捣碎做的饼子，每年春节才吃一次，我们只能热情接待，刚一落座，他们又放起了鞭炮，闹得屋里烟雾弥漫。接着，开始喝酒吃饺子，他们喝酒不只是劝，而是按住你的脖子硬灌，一灌就是一椰子瓢。多亏是米酒，喝几瓢也无所谓。据介绍，原来一到春节，几天几夜的喝，你请我，我请你，我请你你不去，两个街上打起来，打得鼻青脸肿。我们的“翻译”说，如今差了些，我请你，你不去就算了，要不，我也是浪费。人们越来越聪